

中国财税文化价值研究

“中国财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陈志勇 主 编 周春英 副主编



ZhongGuo CaiShui WenHua JiaZhi YanJiu
ZhongGuo CaiShui WenHua GuoJi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中国财税文化价值研究

“中国财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陈志勇 主编 周春英 副主编

ZhongGuo CaiShui WenHua JiaZhi YanJiu
ZhongGuo CaiShui WenHua GuoJi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财税文化价值研究：“中国财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陈志勇主编.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12

ISBN 978 - 7 - 5141 - 0245 - 1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财政管理 - 文化 - 中国 - 国际学术会议 - 文集②税收管理 - 文化 - 中国 - 国际学术会议 - 文集 IV. ①F81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0650 号

责任编辑：白留杰 李 剑

责任校对：王肖楠

技术编辑：李 鹏

中国财税文化价值研究

——“中国财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陈志勇 主 编

周春英 副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教材编辑中心电话：88191354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 esp. com. cn

电子邮件：esbj3@ esp. com. cn

北京欣舒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河北三佳装订厂装订

787 × 1092 16 开 36 印张 660000 字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册

ISBN 978 - 7 - 5141 - 0245 - 1 定价：6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部分 财税理论篇

中国财政文化辨析	叶振鹏	赵云旗	(3)
中国财政与人类	孙翊刚		(16)
《周礼》的财税文化初探	孙文学	王振宇	(35)
论两宋朝在中国封建财税文化史上的地位	王文素		(57)
中国财税文化的复兴与发展取向	陈光焱		(69)
一次关于“税收伦理”的对话	李炜光	姚轩鹤	(85)
中国财税文化发展的历史路径研究	洪 钢		(91)

第二部分 财税思想篇

中国财税思想史与中国财税文化	齐海鹏		(105)
财政文化的核心是“为民理财” ——研读王安石理财思想的体会	叶 青		(116)
中西税收思想文化比较初探	付志宇		(122)
中西方财税文化中社会保障思想研究	王金秀	余名敏	(160)
论中西方若干财税思想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 ——以农村水利设施供给机制为例	廖常勇	樊 玲	谢书鑫
	赵海玲		(172)

传统文化与秦汉财政	马金华	谭笑	(183)
论傅玄的理财思想与措施		谭建立	(194)
经济思想对美国财政实践的影响分析		张青	(217)
晚清时期影响财政支出政策的政治文化因素		申学锋	(223)
从徽州文书看明清徽州的纳税文化		陈勇	(231)
关于纳税人权利的理论思考	甘行踪	叶林	(240)
建设新型财税文化体系的必要性与基本思路	罗宏斌	宋伟	(250)
关于我国课税权建设的若干建议			
——以西方国家历史经验为借鉴		薛钢	(262)
税收文化对纳税遵从的影响			
——兼论中西方税收文化差异		俞杰	(272)
中国传统财税思想发展探究	高亚军	王丹	(281)
浅析中国财政史的文化价值	周春英	王常运	(293)
The Thought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of <i>Guan Zi</i> and Modernization			
of the Fiscal and Taxation Culture		Li Ning	(302)
先秦诸子百家的财税思想与中国财税文化的渊源	徐志	李毅	(312)
俄罗斯税收文化的重建及其启示		肖准	(323)
财税文化导向下的纳税服务优化研究	张艳纯	张茜	(332)
中西古典财税理念比较	赵兴罗	崔少君	(340)

第三部分 财税制度篇

我国财政集权与分权关系演绎的文化透视	张忠任	(349)
中国赋税制度与宪政缺失原因分析		
——兼论我国“政府推进型”宪政制度模式的构建	马金华	(358)
汉武帝与王莽时期工商财税政策比较分析	赵梦涵	(367)
康乾盛世的税收制度文化诱因	曾耀辉	匡小平 (376)
从儒道佛传统文化看我国财政分权的演进特征	李大明	刘森 (38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文化意蕴	王东梅	李波 (395)
论宗教对我国财税政策文化的影响	史吉乾	刘琪 刘孝诚 (402)
税收文化视野中的我国个人所得税	赵仁平	(411)

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财政制度不同的演生模式	史 卫 (418)
唐朝赋税制度评述及借鉴	艾 华 王一惠 (434)
“新公共管理”运动与公共服务市场化	李 农 刘祥龙 范 燕 (440)
文化视角下中国开征遗产税的困境与突破	郭月梅 杨慧芳 (449)
我国古代调控财富分配的实践及启示	赵兴罗 (460)
Environmental Taxation Debate in Japan	Kazuhiro UETA (477)
我国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及其启示	陈志勇 罗凤娇 (493)

第四部分 财政史研究

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与政策调整	侯石安 谭彦红 (507)
财产税理论的演进历程	
——回顾、辨证及启示	胡洪曙 (529)
计划经济体制下基础教育财政制度及其绩效：历史回顾	李祥云 (541)
基于政府职能看唐朝的“公共财政”对当代的借鉴	艾 华 吴 玥 (552)
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及启示	
——兼论完善中国现行分税制	王银梅 (560)

第一部分 财税理论篇

中国财政文化辨析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叶振鹏 赵云旗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世界，人类是创造一切历史的主体，不论是政治发展史还是经济发展史，首先是人的发展史。人的思想观念、文化意识决定着人的行为，从而影响着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文化是人的灵魂，是国家的灵魂，是民族的灵魂，没有灵魂人就不会进步，国家就不会图强，民族就不会兴盛。财政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但长期以来对财政文化重视不够，认为文化是上层建筑，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或者是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把视野局限在财政的狭窄空间，就财政论财政，以至于限制了人的思维，制约了财政制度的创新。所以，重视财政文化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对财政的改革完善、发展创新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研究财政文化的前提

中国文化是财政文化的基础，财政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文化是财政文化的母体，财政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分娩物，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要研究财政文化，必须搞清中国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这是研究财政文化不可或缺的前提。

什么是文化，学术界至今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概念。古今中外学者众说纷纭，各抒己见。中国论述文化最早出现在《周易·贲卦·象传》一书：“观乎天文，以观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句话的意思是通过观察天文判断自然的变化，通过观察人文以达到感化和治理天下的目的。“人文”指什么？这里没有明确的说明，按一般的理解，应该是人伦仪则、道德礼仪、秩序规范等一类的东西。由于这些皆属于人类文化的范畴，所以“人文”指的应该是“文化”。汉代正式开始使用“文化”一词，刘向《说苑·指武》篇中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里是说依靠武力不能使人驯服，只有通过文

化的熏陶和教育才能使天下归顺，只有教而不化的人才可诛之。这句与上句说的意思相近，通过文化达到驯服人的目的，“文化”是与“武力”相对而言的，其内容应该是有关教化方面的内容。晋人束皙也讲到“文化内辑，武功外修”，这些都是指与国家军事手段对立的概念，即国家的文教治理手段。到唐代大学问家孔颖达对《周易》中的“人文”作了解释，认为“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明确指出“人文”是“诗书礼乐”，即古代圣贤的言论典籍，这实际上是孔颖达对“文化”下的定义，亦即文学礼仪风俗等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古人对文化的这种规定性从汉唐时起一直影响到清代，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可见顾炎武所谓的“文化”，也不出孔颖达所说的“诗书礼乐”的范围。

与中国文化较偏重精神教化不同，西方人论述“文化”比较广泛。原义含有神明、崇拜、耕种、练习、动植物培养及精神修养等内容。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就更多地展现了逐渐由物质生产活动引入精神生产活动的特点，十八世纪以后演化成个人的素养、整个社会的知识、思想方面的成就、艺术和学术作品的汇集，并被引申为一定时代、一定地区的全部社会生活内容。如1690年安托万·弗雷蒂埃的《通用词典》中，把“文化”定义为“人类为使土地肥沃，种植树木和栽培植物所采取的耕耘和改良措施”，并注释为“耕种土地是人类所从事的一切活动中最诚实、最纯洁的活动”。看来，此时西方人观念中的“文化”只是被用来隐喻人类的某种才干和能力，是表示人类某种活动形式的词汇。“文化”一词成为一个完整体系的表示方式即术语，大约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形成。之后文化和文明常被看作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学者们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探讨文化现象及其历史发展，给“文化”做了许多解释。其中较有影响的第三种观点是方式论，即认为文化是一定民族的生活方式，包括了人们的兴趣、爱好、风俗、习惯。如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者鲁斯·本尼迪克特认为：“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动方式，一种使这个民族不同于其他任何民族的方式”。第二种观点是过程论，认为文化是人类学习和制造工具，特别是制造定型工具的过程，包含了人类智力和创造能力的不断进化。第三种观点是复合论，认为文化是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音乐、风俗、法律以及其他种种能力的复合体。如被誉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伟大的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说：“文化”是人类在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创造的“包罗万象的复合体”。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

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① 在罗森塔尔·尤金所编的《哲学小辞典》中，认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里既包括精神的又包括物质的，涵盖了人类的整个活动。1952年，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发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对西方自1871~1951年期间关于文化的160多种定义做了清理与评析，并在此基础上给文化下了一个综合定义：“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他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的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他们所带来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这一文化的综合定义基本为现代东西方的学术界所认可，有着广泛的影响。

比较中西有关文化的论述，有了一个基本的分野：中国论文化多从狭义而言，把文化限制在精神文化的范畴，即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思想、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当然，中国的学者也有从广义的角度论述文化的，最典型的如研究中国文化的佼佼者、我国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的观点。他认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如吾人生活，必须依靠于农工生产。农工如何生产，凡其所有器具技术及其相关之社会制度等，便都是文化之一大重要部分。又如吾人生活，必须依靠于社会之治安，必依靠于社会之有条理有秩序而后可。那么，所有产生此治安此条理秩序，且维持它的如国家政治、法律制度、宗教信仰、道德习惯、法庭警察军队等，亦莫不为文化重要部分。有如吾人生来一无所有，一切都靠后天学习而后能之。于是一切教育设施，遂不可少，而文化之传播与不断进步，亦即在此。那当然，若文字图书，学术学校，及其相类相关之事，更是文化了……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② 又如中国著名文化学专家任继愈先生，把文化理解为：“举凡文艺创作、哲学著作、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饮食器服之用，都包括在内。它既包括高文典册的圣经贤传，也包括布帛菽黍的制作方式以至于举止言谈的风度。”^③ 但在中国古代这样的定义较少，近现代逐渐增多，这是受西方文化影响所致。西方学者所说的“文化”，大都是指广义的文化，可以说在他们眼里，文化无所不是，无所不包。

① 泰勒：《原始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② 梁漱溟：《中国文化的特征》，载李中华：《中国文化概论》，中国文化书院1987年版，第305页。

③ 任继愈：《民族文化的形成与特点》，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2辑第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这一分野为研究中国文化内涵打开了新的途径,不论学者从哪方面解释,有多少说法,大致不外乎两个方面:一种是从广义的范围来考察,一种是从狭义的范围来分析,所以文化不论多么复杂,可以用最简单的办法,划分为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两大种类。这种划分并不是无奈或武断,而是实事求是的,符合中外文化历史发展实际。更重要的是具有一定的科学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是这样划分的。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解释:“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能力和创造的成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化划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文化的范畴包括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物质和精神的全部产品;狭义文化则指人类的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和设施以及世界观、政治思想、道德等。应该说,这样的定义是具有包容性和概括性的,基本上覆盖了古今中外有关文化的解释。因此,这样的结论也是目前比较权威的定论。

到此“文化”的定义似乎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学术研究不是计算公式,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知识时代的到来,科技的日新月异,文化的概念一方面其自身会不断地吐故纳新,另一方面学术界对现有的定义还会有新的认识和解释。这给财政文化的确立又增加了难度,在众说纷纭面前财政文化又面临着新的选择。

目前国内关于文化有多达上百种不同的观点和认识。由于各自的视角不同,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形成各具特点、各有理由的观点,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置可否。中国文化学界对现有的上百种文化定义进行了归纳、分解等方式的研究,试图使文化呈现多层次、多类型的多元形态,使各种文化既有门类又有区别。有些学者在现有文化定义的基本特性的基础上,对文化定义予以归纳分类,把“文化”分做三个层次:一是观念文化,主要指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它既不同于哲学,也不同于意识形态,是介于两者之间而未上升为哲学理论的东西,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二是制度文化,是指在哲学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制度,它们或历代相沿,或不断变化,或兴或废,既没有具体的存在物,又不是抽象的看不见,是一种中层次的文化;三是器物文化,是指体现一定生活方式的那些具体存在,如住宅、服饰等,它们是人的创造,也为人服务,由于看得见摸得着,所以是一种表层次的文化。

其中分析比较细致的是胡瀚的七分法:一是现象描述性的定义;二是社会反推性定义;三是价值认定性定义;四是结构分析性定义;五是行为取义性定义;

六是历史探源性定义；七是主体立意性定义^①。

又有学者以胡潇的七分法为基础，将诸种文化定义精练成五类：一是描述性定义，以对文化内容或成果详加罗列和具体描述为特征；二是社会性定义，从文化对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反映的维度上说明文化自身，突出文化作为社会动态演变状态所规定的标识意义，这些说法都是一个取向，即社会性定义，很显然，注重社会的客观因素尤其是社会实践活动及社会关系结构对人的文化的制约，这是社会性定义的鲜明特点，与描述性和主体性定义正好相反；三是主体性定义，此类定义尤其注重发明和强调“人”这一主体对文化的特殊意义和本质地位，主体性定义高扬“人学”的旗帜，直指本心，深入发明文化的属人精神特质和人的内在的文化本性，揭示了文化即“人化”的思路，是很见深度和启发性的；四是功能性定义，从文化对人的意义、功用和价值的角度去界定文化，强调文化是属人的独具特色的行为工具和生活方式；五是历史性定义。把文化放到历史发展演进的层面，从文化的累积和传承的过程中去理解文化，是该类定义的主要特点。

以上古今中外学者对文化定义的研究和归纳，为研究财政文化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前提和基础，财政文化定位，需要一番认真的选择。

二、财政文化的定位

目前古今中外学者对文化定义的解释和分类归纳的研究，虽然有些观点是非常明确的，给我们的研究带来帮助，但也有一些观点并非全面，只是一家之言，还需要分析判断，不可采取“拿来主义”。

（一）财政文化狭义论

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的划分，财政文化应该有两种，一种是广义财政文化，另一种是狭义财政文化。广义财政文化——在财政实践活动中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狭义财政文化——只在财政实践活动中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财政思想、财政理念、财政信仰等，不包含物质财富。那么，财政文化应该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我们认为应该归属狭义的定义。

其原因首先是因为文化不应该是物质的。在选择财政文化应该属于广义还是狭义文化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经济

^① 胡潇：《文化现象学》，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

基础和上层建筑是有着密切联系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二者是有明确区别的。广义文化的定义把人类的生产活动,甚至“人类为使土地肥沃,种植树木和栽培植物所采取的耕耘和改良措施”等把人类在生产活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都包含在内是不妥当的。因为这些内容是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不是上层建筑的范畴,而文化是属于上层建筑的,而且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宗教、艺术、文化等,文化只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广义文化的概念超过了上层建筑的范围,严格地讲广义文化的概念是不严谨的,是比较模糊的,财政文化不应该是广义文化的概念。

文化的产生离不开人类的活动,但人类的活动与文化是有区别的,所以财政的实践活动不等于文化。因为财政实践是一种历史事实,属于财政历史的范畴,换言之,它是实践活动,是形成文化的开始,而不是文化本身。虽然人是历史的主体,人的实践活动创造一切,这只是就某种方面而言,并不是说实践活动都是文化,一切活动都是文化,否则文化与实践就毫无区别了。如果说实践就是文化,实践活动可以代替文化的存在,那么还有什么必要谈文化?所以,财政实践不是文化,如财政收支不是文化,而财政收支的形式和方式中体现的指导思想、原则、行为规范则体现一定的文化。

虽然广义文化概念认为文化既是物质财富又是精神财富,但物质与精神毕竟是有区别的。精神财富代表着文化,物质财富是文化产生的基础,文化是物质升华的结晶,物质财富是文化的载体。如建筑物是物质的,从建筑物的功能来说,任何地方的房屋都是一样的,但房屋由于所在地点的不同,环境的差异,其风格是大不一样的。欧洲建筑物的风格是哥特式的,亚洲建筑物的风格是庭院梁柱式的,这些建筑物反映出来的不同的建筑风格才可称作建筑文化。中国也同样如此,北方建筑物的风格不同于南方建筑物的风格,北方建筑物呈现粗犷的风格,朴实雄厚,南方建筑物风格表现为秀丽,白墙黛瓦,“粗犷”与“秀丽”各自反映了南北不同的文化。人类在财政实践活动中同样创造了物质财富,如财政收入不断增加,财政收入是财政活动中的最大物质财富,它能够称作文化吗?又如在财政管理中形成的法律法规和财政制度,包括预算法、转移支付法、政府采购法等,这些法规制度也是财政实践中创造的物质财富,但其本身也不是财政文化,只有法规制度中反映的具体内容才是财政文化。再如在财政研究中形成的著作,也是人们在研究中做出的成果,形成的物质财富,但这些书籍也不是财政文化,书籍中反映的思想和观点才称其为财政文化,书籍只是财政文化的载体而已。还有财政实践中遗留下来的器物,包括账簿、计算工具、办公用品等也不是财政文化,在他们身上反映的不同时期的特点、科学技术的含量才是财政文化。

可见,物质财富不等于文化,只是反映的文化。

另外,广义文化的包容性太强了,覆盖面过于宽泛。由此造成文化概念的淡化和模糊,甚至不能明确地知道文化的内涵。如果文化包括人类的一切活动,那么文化史与人类发展史有何区分?如果文化史包括政治、经济、军事,那么文化史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有何区分?如果文化史包括一切物质的存在,那么文化史与建筑史、交通史又有何区分?显然,文化史是不能代替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人类史、社会发展等史的,它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内涵与特征。

所以,财政文化应该是狭义的,只指在财政实践活动中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财政思想、财政理念、财政信仰等,只有这样才具有自己的特点。

(二) 财政文化观念论

文化学界对文化定义的归纳分类对我们全面深入认识文化是有益的,但其中的局限性也是应该注意的,否则财政文化也会陷入学术迷蒙,不知归属与去向。

目前对文化定义的分类之所以呈现出多样性的色彩,主要是切入点和侧重点的不同。从文化成果的角度对“文化”作现象性描述,从文化对人的功用角度对“文化”作功能性界说,从文化的历史演变性角度对“文化”作历史性定义,从文化对社会发展的标识性和对人的主体性反映的角度予“文化”以社会性、主体性意义上的阐述等,都是有意义的。这些考察文化问题、界定“文化”概念的视角和线索,从不同方面深化和推进了对文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定义也有值得推敲和商榷的地方。如描述性的文化定义,把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内容总摄于“文化”的范畴,这实际属于广义型的文化。广义文化一般具有描述性的特征,使文化无所不包,无所不指。这样的含义不免过于宽泛,造成“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可装”,以至于使文化庸俗化。

主体性定义过分地强调了人的作用。如卡西尔认为人所有的先验而自在的能力,其外化和实现即展现为文化的结晶。人类学认为文化与社会结构植根于人类的心灵,文化不过是人类内在结构的缩影而已。这样过分强调主体作用,往往会陷入“见人不见物”的泥沼,忽视了外在于人的社会历史的客观因素的分析,从而把“文化”作了先验、静止的抽象处理,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社会性定义恰巧与主体性定义相反,强调了社会环境和客观条件对文化绝对的决定作用,过分夸大客观因素对文化的决定作用,就会“见物不见人”,忽视了文化主体人的内在能动性。

功能性定义仅仅指向了文化的功用价值性。如英国功能学派认为文化是“一个满足人的要求的过程,为应付该环境中面临的具体、特殊的课题,而把自

己置于一个更好的位置上的工具性装置”。我国孙中山先生指出：“文化是人类为了适应生存要求和生活需要所产生的一切生活方式的综合性的表现。”^① 功能性定义，过分强调了人的功利思想，但对文化的社会及人的复杂因素缺少必要的反映。

历史性定义只是强调了文化概念发展过程性的维度。如美国社会学家福尔森认为：“文化是一切人工产物的总和，包括一切由人类发明并由人类传递后代的器物的全部，及生活的习惯。”我国学者杨邦宪也认为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社会历史的发展水平、程度和质量的状态。”^② 这种定义对文化成就缺少必要的反映。不难发现，这些文化定义分类用以说明文化的方面性内涵是可以的，界定“文化”则不甚恰当，因为存在着某种形而上学的单面性，财政文化不能随意去归队。

由此看来，在文化的分类上，一是财政文化不属于制度文化，因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制度，虽然反映了人的思想，社会的意识，但不是思想和意识的本身，只是思想和意识的载体。二是财政文化不属于器物文化，器物是人类生活和活动的见证，虽然也体现了人类在一定时期的文化取向，但器物不等于文化。三是财政文化不属于描述性定义，因为描述性定义是广义文化，包括了物质财富。四是财政文化也不属于社会性定义、主体性定义、功能性定义和历史性定义，因为主体性定义疏忽了社会历史的客观因素的分析，社会性定义忽视了文化主体人的内在能动性，功能性和历史性定义对文化的社会及人的复杂因素及文化成就都缺少必要的反映，用其分析财政文化的类别也是有缺陷的。

相比之下，财政文化应该属于观念文化。主要指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而不是一种表象的文化。也就是说它是人类一切活动背后的东西，或者说是一切物质所体现的内涵。

三、财政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财政文化定位是研究财政文化内涵与特征的基础，在财政文化狭义论和财政文化观念论的范畴内，财政文化有着自己的内涵与特征。

① 庄锡昌：《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 页。

② 杨邦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评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 页。

（一）财政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通过以上的分析选择，至此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明确的财政文化的概念：财政文化的内涵是财政实践活动创造的精神财富，其外延包括财政思想、财政理念、财政信仰等。它属于一种观念性文化，是财政活动中长期形成的群体意识和价值观念体系。它蕴藏在一切财政的实践活动中，体现在财政活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上，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财政思想。财政思想虽然是在财政实践中形成的，但反映的是指导财政实践的思想观念，是财政文化的主体。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丰富而珍贵的财政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①；孔子主张“政在节财”^②；孟子认为“薄其税敛，民可使富”^③；荀况提出“节其流，开其源”^④；墨翟宣扬“官府实而财不散”，“官府实而万民富”^⑤等等。封建社会随着财政内容的进一步丰富，财政活动进一步扩大，财政制度进一步健全，出现了众多的财政思想。如秦汉时期，贾谊有“贵粟论”，桑弘羊有“专卖论”，谷永有“薄收赋税、毋殫民财”论^⑥，毋将隆有关于国家与皇室财政“别公私”说^⑦，桓谭有“以工代赈”论，荀悦有田赋“中正”说。魏晋时期，傅玄有租税“至平”、“趣公”和“有常”三原则^⑧，周朗有反“计资而税”论^⑨，贺琛有紧缩财政的倡议^⑩，苏绰有“均赋役”论。唐宋时期，苏孝慈有反对“回易取利”说，刘晏有用一般商业经营原则处理财政的理论，杨炎有“量出制入”的理论，杜佑有反对“直取之于人”的理论，李珣有税与价格的理论，王禹偁有“山泽之利与民共之”的理论^⑪，范仲淹有重商税的理论，欧阳修有国与商共利的理论^⑫，王安石有财政“变通天下之财”的理论^⑬，叶适有以商富国论，朱熹有均税说的

① 《国语·齐语》。

② 《史记·孔子世家》。

③ 《孟子·尽心上》。

④ 《荀子·富国篇》。

⑤ 《墨子·尚贤中》。

⑥ 《汉书》（卷85），《谷永传》。

⑦ 《汉书》（卷77），《毋将隆传》。

⑧ 《傅子·平赋役篇》。

⑨ 《宋书》（卷82），《周朗传》。

⑩ 《梁书》（卷38），《贺琛传》。

⑪ 《宋文鉴》（卷42），王禹偁《应诏言事疏》。

⑫ 《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45），《通进司上书》。

⑬ 《宋史纪事本末》（卷37），熙宁二年2月条。